

□ 理论探讨

评《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 域外传播与研究》

任洪国 刘献彪

2012年11月,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很精良的学术专著《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这是泰山学院教授宋绍香潜心俄苏(兼及日本)汉学研究 30 年的学术“结晶”。正如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在为本书撰写的《小序》中所说,“这部《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全然是他(宋绍香)亲自蒐集资料、深入思考的结晶;本书企图总揽当前域外中国新文学译介与研究的总趋势;分别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解放区文学在日本、俄苏、美国和欧洲的译介与研究概况;评述了日本、俄苏、美国、欧洲对中国现代作家和解放区作家作品的分析,对中国新文学的创新性与现代性有自己独到的看法。通篇来看,本书资料丰富,结构严谨,阐释简练,致使初学者开卷有益,已入堂奥者亦可在某些方面得到启发”。

乐黛云的《小序》,的确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仔细拜读了本书,并涉猎了部分相关的汉学研究资料后,我们感到,从总体来看,新时期以来汉学研究成绩斐然,然而也存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一个较为明显的现实是,近数十年来汉学研究对古代文化及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关注较多,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则略显薄弱,尤其对中国解放区文学的国外传播与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厚古薄今”的思想和“远离马克思”的艺术观严重阻碍了当前汉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的出版则部分地缓解和弥补了这一缺憾。著者借助国际著名汉学家的观点和论点,重新阐释了中国解放区文学的艺术成就、历史

价值和现实意义,还原了解放区文学的“本来面目”。可以说,这是本书的最大亮点。

一言以蔽之,《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的出版,是中国汉学(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它实现了几个重大“突破”和创新。具体可概括为:

(一)敢为天下先——个体学者攻关“国际”研究。宋绍香涉足汉学研究领域已 30 多年,主要是对俄苏汉学中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进行再研究。然而,他在搜集俄语资料的同时,也注意搜集其他语种的原文和翻译资料。多年下来,除俄语资料外,也收集了数百万字的关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其他语种的翻译资料。一般的课题研究,通常都是先确定课题,然后根据课题需要而去搜集相关资料;而宋绍香却是先有了“资料”,尔后才确定了“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这一课题,这就使得本书在史料方面扎实可靠,使其学术价值有了充分的保障。

(二)资料丰富、翔实、比较齐全。学术资料是学术研究之根。北大著名学人严绍盪多次强调,没有资料的著作不成其为学术。本书另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资料的丰富、翔实,而且比较齐全。这一点,还是用“数字”来说话;且不说本书的中外文参考书目就有 165 种,本书所做的实实在在的注释亦近六百个(588),由此可以推断本书所引用资料之丰富、之翔实、之齐全。

(三)资料的系统梳理与科学的阐释架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丰富的资料无疑是学术的一种优势,然而,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成为一种

“包袱”——资料罗列。如何把如此庞杂的史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整理,使其“不露痕迹”地纳入到一个有序的阐释系统中,对于任何著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本书著者巧妙地将研究对象分为整体文学概观和重点作家作品研究两大系统;每一系统又分为现代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两个子系统;在每个子系统中,再划分为美国、日本、俄苏和欧洲四块,抓住了这四块,也就是抓住了域外汉学的“牛鼻子”;全书的阐释构架有机搭配,科学合理,真正做到了每节文本分则为文(论文),合则为书(著作)。应该说,没有对资料的娴熟和系统梳理,便难以形成科学的阐释架构。

(四)学术观点的突破与创新。更可贵的是,《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不是简单地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而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把有限的资料用到学术研究的“刀刃”上,更确切地说,著者更关注学术,尤其注意结合本国的实情进行研究。以其中第四章现代作家作品研究之二郭沫若著作在日本为例,作者将其分为译介、研究、评价三部分,作者不仅详细列出了日本自 1922 年以来对于郭沫若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以及对郭沫若的创作及其科学著述的研究,而且依据资料,描摹出了日本译介郭沫若的轨迹与分期,并对其进行了规律性总结。作者不仅仅列举了日本学者对于郭沫若的称颂,也提到了他们对于郭沫若文学不足之处中肯的批评。总的来看,作者对于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是本着冷静、公正、客观、全面的态度的。该书中列举的著作刊物信息齐全而具体,大大提高了其可靠性和可用性,它不仅是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学术性著作,也是一部实用性极强的工具性书籍。

由于占有大量的翔实丰富的学术信息和资料,加之深邃的创新性学术思维,《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的著者对西方中国新文学研究有其独到的见解:(一)在比较欧洲和美国的汉学研究后,他提出了“作为中国学的域外中国新文学研究”概念。他认为美国的“中国学”,远离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传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汉学。传统汉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古典文献、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哲学、艺术等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方法是通过语言、训诂、考证等传统的人文研究方法,研究目的是通过中国这异域世界

来反观自身,重塑自己。虽然美国的大多数民主知识分子,仍然坚持欧洲汉学传统,继续运用传统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做出了不菲的成绩,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其研究目的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实用,不是为了反观自身,重塑自己,而是为了改造中华,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这样的中国新文学研究,宋绍香认为是“非汉学”的“域外中国新文学研究”,他称其为“作为中国学的域外中国新文学研究”。(二)《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第三章以丰富的史料介绍解放区文学译介、研究概况之后认为,域外解放区文学传播与研究的实践证明:即使不同意识形态的异质文化间也是完全可以进行对话和沟通的。这些观点对于当前汉学和中国文学研究而言都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三)著者在反观国内外对解放区代表作家赵树理的研究时,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赵树理文学的确是一份独具特色的、弥足珍贵的、不可复制的文学遗产。它不但具有文学价值,而且更具有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然而当下的文艺研究家们大多似乎对其重视不够。对于赵树理及其文学的真正意义,似乎还不如外国学者认识得那么清楚和深刻;对于产生赵树理文学的 1940 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国情,似乎还不如一个外国人了解。这是十分令人担忧和值得反思的。宋绍香的这些学术观点,虽是平实的,但却是宏观的,甚至是“超前”的。

总体来看,《中国新文学 20 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是当前汉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收获。它在有关新文学域外传播与研究方面具有较大的开拓意义。当然,像任何一部学术著作一样,该书也不是完美无瑕的,依然存在着一些缺点。譬如,在资料收集上还可以做得再全面丰富一些,在史料阐释上还可以再深入一些。不过我们看到,这些缺陷并不是作者认识或能力的问题,是由于时间限制和客观精力的问题,作者凭一人之力确实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如此繁重的工作。随着研究资料的更加丰富,假以时日,我们相信宋绍香一定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与研究方面取得更高的成就。□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潍坊学院文学院,潍坊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